



我家的巾帼英雄

张素莲

书架上那本三姑寄来的回忆录，记载着大姑投身革命的往事，字里行间满是抗日战士的英勇与战争的残酷。

三姑写道：“我们曾住在五台山的三岔口村。这村子是通衢要地，属兵家必争之地。1936年2月，红军东征抗日入晋。端午节那天，母亲正在包粽子，一位红军战士来到院中，笑眯眯地看了看，就走了。后来，区公所就设在我家院子，村里还成立了妇女会等组织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我家的父母姐妹们也参加了这些活动。”

“1939年，一批参加抗日的大学生住进我家，大姐常听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。本就识字的她深受触动，瞒着父母跟着队伍投身抗日。随着战事推进，三岔口遭日军劫掠，村子被烧光，我们全家搬回老家东茹村。”

“1942年，我从邻居处得知大姐消息。几年未见大姐，我很想念，就瞒着母亲，偷偷和邻居到了大姐工作的那个村。当时，大姐他们白天在村里工作，晚上为了安全，就在山洞里睡觉。那天，我们俩见面后有说不完的话，大姐晚上就没回山洞，陪我在村长家过夜。半夜，村长听到外面有动静，起床悄悄看，发现是有一队鬼子进村了，正在看着山上指指点点。村长马上叫醒我们俩，把我们藏在干草房里。天亮后我们头上罩着毛巾，扮成家庭妇女，在厨房烧火做饭，躲过了伪军搜查。后来才知道，因汉奸告密，敌人在山上抓走7名工作人员，

严刑拷打后将其残忍杀害。想来若不是我去探望，大姐那晚回山也难幸免。

“大姐的丈夫是陕西人，自幼参加红军，转战五台时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特务营营长、五台支队长，因作战勇猛，屡受嘉奖。大姐任妇救会主任，两人因工作互生情愫，经人牵线、领导批准，1944年末结为革命伴侣，被笑称为‘秦晋之好’。婚后他们各司其职，姐夫带兵作战，大姐组织支前，并肩战斗。日本投降后，他们又投身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，最终都在吉林军区任职。”

上文中的大姐就是我的大姑，是全家心中的巾帼英雄。东北表哥的回忆录也提及此事，同样满是崇敬。母亲曾说，太原解放时，大姑骑马进城，雄赳赳的模样格外威武。三姑、四姑也受其影响，新中国成立后参军并赴抗美援朝战场，在战火中成为英姿飒爽的女战士。

如今，她们虽已离世，但往事一直在晚辈中传颂。我们深知，没有先辈的牺牲奉献，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那年，我家在东北和武汉的军人后代们回五台祭祖，又到太原团聚。席间共话往事，都为张家巾帼英雄们自豪。大家热血沸腾，表哥举杯高唱《咱当兵的人》。我们在场的，无论是否当过兵，都被这样的气氛所感染，纷纷举杯应和，歌声嘹亮。

伯父们的烽火岁月

王秋英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。翻开那段浸满血泪的历史，日本侵略者烧杀掳掠的暴行罄竹难书，而中华儿女浴血抵抗的壮举让人热血沸腾。说起来，我们王家还有两位亲人投身抗战，英勇杀敌。

自九一八事变起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，百姓瞬间坠入苦难深渊。1937年，刚从口外经商归来的祖父，目睹汾阳县被鬼子糟蹋得满目疮痍，悲愤交加。恰逢八路军进村征兵，他毅然送他两个最大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。

奶奶的家在山西汾阳县三泉镇任家堡。童年第一次回老家的记忆至今清晰：在村里

七拐八绕后，父亲指着一座院落说：“到家了。”我抬头望见门楣上的牌匾，黄底红字刻着“王仁俊 光荣烈属”——那是我的大伯父。在崇尚英雄的年代，每次进出大门或与同学说起，自豪感总会油然而生。

从父亲和姑姑那里得知，大伯父生于1917年，1937年参加革命，在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当战士。西进途中，部队在山西兴、岚二县的公路上与日军相遇，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，名字被载入《汾阳县志》的“英烈榜”。

二伯父王仁桀去世已20年，生前对往事记得很清楚。他与大伯父一同加入120师，后来分赴不同战场。他当过

步兵班长，为罗瑞卿政委做过通信员，在兵工厂管过物资、摇过发电机、拉过大炮……那时开展运动战、麻雀战、游击战，炮火连天、风餐露宿成了常态，让他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艰苦。抗战结束后，他又投身解放战争，从军15年后从四川复员回乡，带回的搪瓷盆和茶缸上印着“第四野战军”字样。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，他还领到了国家颁发的纪念章。

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，多少家庭支离破碎；无数青年为驱逐日寇，奉献青春，抛头颅、洒热血。他们的生命虽短暂，却用爱国热血谱写了最壮美的人生篇章。

砂村抗战记忆

赵志峰

姥姥家在定襄砂村。82岁的老妈至今记得，姥姥曾跟她讲过，当年她还不到两岁，常跟着大人们“跑反”。一听说鬼子要来，家家户户都往村东的小山上躲。有一回“跑反”回来，院子里的景象让大人们又气又急：整个院子臭气熏天，家里的猪被鬼子宰了，内脏扔得满地都是；菜窖被当成了茅坑，幸好临跑时把几床被子扔到了菜窖里，要不菜就没法吃了；放粮食的屋子成了牲口圈，粮食撒得到处都是……那时乡亲们成天惶惶不安，唯恐大祸临头。

一天清早，还没吃饭就听人说鬼子来了，村民根本来不及跑，全被鬼子一家一家撵到了村公所。先是让村民分开站，男人一伙，女人两伙——剪了头发的女人单独站着，在鬼子眼里，剪发的女人多半是积极分子，可能跟八路军有关系。姥姥那时也剪了发，抱着一岁多的妈妈站在剪发女人堆里。姥姥的公公走过来想替她抱孩子，姥姥说：“还是我抱着吧，要死就娘俩一起死。”当时，村公所对面戏台上架着机关枪，姥姥心想这下完了，谁也活不成了。可后来鬼子又把村民赶到村外铁路和公路之间的渠沟里，叽哩呱啦喊了一通，意思是有个八路军战士跑到村里了，谁看见了就说出来，不然就统统枪毙。大伙儿都说没看见，鬼子气急败坏地咆哮着。沟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，铁道上架着机枪，村民都觉得这下真没了活路。没承想过了一会儿，鬼子把一个五花大绑的人带到铁道上，说是逮住了八路军，竟把一村人放了。

就在村民被赶到铁道边渠沟时，躲在自家夹墙里的姥爷趁机溜出来，赶紧跑到东山上找到游击队。游击队火速赶到离村子二里地的蒋村一带，正好遇上撤退的鬼子，双方激烈交火。游击队有备而来，又占着居高临下的地势，打得鬼子手忙脚乱，并趁乱救下了那名八路军战士。鬼子丢下几具尸体，仓皇逃走了。

抗战期间，日寇在定襄制造了包括大南邢、智村、芳兰等8起惨案，老百姓对他们的残暴行径恨之入骨。那些年，姥爷常跟着附近的男人们，趁夜深人静去炸铁路桥、扒铁轨。等鬼子发现时，他们早跑到远处，接着毁掉一段又一段铁道。每个晚上都把鬼子搅得发疯，却又无计可施，有力地阻断了敌人的物资和人员运输。

姥爷他们还给山上的队伍送蓝靛——这东西既能染衣料，又能做药品。有一次，姥爷和几人从太原运回一批蓝靛，经过县城鬼子岗楼时，他急中生智，跟同行的带孩子妇女商量：“鬼子问起，就说我是孩子爹，这蓝靛是给庄子里染坊用的。”果然骗过了鬼子，把蓝靛顺利送到了目的地。

家里的姥姥她们也没闲着，常常连夜做军鞋，做好就收起来，由男人们送到队伍上。

“日本鬼子根本想不到，看似柔弱的老百姓，抗日斗争搞得轰轰烈烈、有声有色。这就是咱们能坚持全民族抗战、最终取胜的原因。”老妈说着，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。

